

逝者

徐中玉：智者已远，风范长存

本报记者 张滢莹

他从容地穿过了这个时代

南帆（文学评论家）

几天前的一个凌晨，徐先生终于动身西去。我们这些学生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内心还是涌来巨大的疼痛。“仁者寿”，徐先生的生命已经是一个奇迹，我们总是希望奇迹能够一直持续。

我相信，徐先生走得安详，轻松。该留给我们的，他很早以前都交代好了。

很多年以前，许多华东师大的学生都说，他们见过徐先生疾步如飞地穿过校园。徐先生总是在忙碌，总是有那么多事情等待他处理，总是有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文章要读。现在，徐先生可以不那么忙了。徐先生的忙碌会在华东师大一代又一代的学生那儿成为一个著名的传说。

我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讨论徐先生巨大的学术贡献。徐先生的著作陈列在那里，有目共睹。我要说的恰恰是，徐先生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学术之外。

徐先生逝世的第二天，我在网络上重新发表了一篇旧文，题目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我的心目中，徐先生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已经不多见了，但是我们还是认得出来。

一个朋友在我的文章后面留言，说徐先生身上有书生气，也有英雄气，我深以为然。我觉得，书生气和英雄气在徐先生身上汇合在一起，成为两种互相激励的品质。徐先生以书生形象出现的时候，我们同时会清楚地感受到他身上的耿直、硬朗之气。他忧国忧民，尽职尽责，从不退缩，哪怕为一次拍案而起承担二十多年的厄运。一介书生，无欲则刚。另一方面，二十多年的厄运并不能窒息精神的内在活力。徐先生以不屈的姿态挺身负重的时候，我们又能清楚地感受到他的深邃和洞见。二十多年的时间读书数百种，写下数百万字的卡片摘要和读书笔记。他的坚定并不是逞一时之气，而是饱含深厚学识的涵养。

徐先生生活的这一百多年，风云激荡，惊涛骇浪，这种时代最难坚持的就是书生气和英雄气。但是，徐先生做到了。他从容地穿过了这个时代，宠辱不惊。他的前行身影将始终存留于我们的记忆之中。

作为学生，我们曾经近距离地与徐先生相处，在徐先生的书房里上课。我们可以捧一杯热茶，高谈阔论，互相争辩，徐先生从不限制学生的思想，而是微笑着指点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徐先生尊重各种理论探索，同时，他也从不会因为趋时阿世而隐瞒自己的观点。他的心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从未减轻分量。当学生的时候，我不断地惊叹徐先生的渊博和丰富，常常悲观地觉得这是我们不可能企及的境界；时至今日，我已经愈来愈清晰地意识到另一个事实：徐先生的人格所具有的感召力。

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说来，人格之中凝结了一些基本的前提。我们与徐先生的距离仍然那么大，但是，我们明白了努力的方向。这个意义上，徐先生是我们永远的老师。徐先生不朽！

（本文系作者在徐中玉先生追悼会上的发言，标题为编者拟）

在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等共同倡议下，全国部分高校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新的《大学语文》教材，并将中断了20余年的大学语文课程重新带回课堂。这本1981年出版的新中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如今已出至第11版，发行量超过3000万册，重新接续上无数学子的人文素养教育，其意义之深远，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正如徐中玉视天下学子为自己的学生一般关心，他给予学生的，是润物无声的呵护。1980年代，南帆考入华东师大，成为徐中玉的学生。每隔一段时间，包括他在内的几个研究生都会在徐先生家的书房上课，坐在一张沙发上，各自手捧一杯热茶，自由自在地讨论乃至激辩。“徐先生从不干涉我们的想法。他通常是坐在那把硬木椅上，仔细倾听我们的观点，最后略为点拨，或者做一个引导性的总结，留下让我们自己领悟的空间。”

在回忆与先生的交往时，多位当年的学生、如今知名的作家、学者不约而同提到“如遇之恩”一词：写就小说《冬》后，孙颙因为徐中玉等老教授的首肯，才获得赴京开会的机会，从此正式迈入文坛；陈子善作为培训班学员参加考试，先生告知了他通过考试的消息；毛时安毕业分配时面临困境，先生亲自为他拟写推荐信；在先生鼓励下，赵丽宏、王小鹰以文学作品作为毕业论文，完成学业……徐中玉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了培养作家的“摇篮”，孙颙、南帆、赵丽宏、王小鹰、毛时安、陈丹燕等，以及格非、李洱等后来入学的作家，均位列这个知名的“华师大作家群”中。

毛时安一直记得，上世纪末，在一次因为先生79岁生日而发起的聚会中，徐中玉说，他一辈子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最高兴的是自己的学生都成了国家的人才。“他只有一个愿望，做一个问心无愧的人。他想这样做，他努力这样做，但也没有完全做到。大家都比他年轻，他希望大家监督他，和他一起做这样的人。”如今斯人已远，风范长存。也许正如南帆所说，该留给我们的，他很早以前都交代好了。

述的。”他同时深深感受到的，是某种历经大半个世纪仍历久弥新的文本魅力：价值取向上的先进性和学术方法上的科学性，是徐中玉先生的文论至今仍然保有鲜活生命活力和丰富启示意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忆及先生时所言：经世致用，融汇古今。徐中玉一生信服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的言论，在他笔下，无论是古论，还是国外精粹，总有能化为今用的地方，而今用绝非书斋之用，而之为天下之用。

徐中玉与巴金两位先生有着一段深厚的友谊。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早在巴金《激流三部曲》全部问世，却遭受责难与“幼稚”“无用”的讥讽时，徐中玉就曾站出来，予以高度评价：“巴金先生用了他那汹涌的热情写下的这个‘正在崩坏中的资产阶级的大家庭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的确是真实的历史。他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五四以后一般青年反抗封建势力，反抗吃人礼教的鲜明生动的图画。”这不是他第一次站在文学批评前沿的仗义执言，这种对于客观真理的直言与坚守，从未更改。

早期探究文学批评原理时，徐中玉在多种报刊上刊发了大批文章，对于文学批评的标准、伦理、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批评的创造性等方面均有论述，纠偏当时“贵古贱今、贵远贱近”的批评偏见，并提出批评家应有“独自评价的能力”：只有自己体察、融会所及，而非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来的意见，才能够得上批评二字的本义。时隔半个世纪后再谈文学批评时，他初心未改：“文学上哪个主义都是暂时的，喧哗一阵就没有了。……我愿强调研究的个性、多元性，期待大家多讲一些自己有体会、经历的老实话，才会有些参考价值。”

对于“正确的东西”的坚守，也许正是徐中玉先生后来担任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主编等多项职务的精神力量来源。每当被问及为何有精力做这么多事时，他总是淡然一笑：有价值，值得做，就去干嘛。而如今人们最熟悉的，也许莫过于他主编《大学语文》的历程。上世纪70年代末，

2019年6月25日凌晨，105岁的教育家、文艺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中玉与世长辞。于一位老者而言，105岁已是高寿，但对于徐中玉先生，人们却希望这个噩耗永远不要来临。直到三日后的追悼会举行，数百亲朋挚友、学生、各界人士相聚为他送行，将一朵朵寄托哀思的黄色康乃馨轻轻放下时，大家才真正意识到，智者已远，此后华东师大内再也不可能看到他清癯健行的身影。

这亦是一次缓慢的落幕。在华东师大，会聚了一批名家大师，他们是这所大学厚重人文学养的奠基人，亦是后来知名的“华师大作家群”的根基所在。时光如梭，先人陆续远行，史存直、施蛰存、钱谷融、徐中玉，这几位作家李洱曾被师长告知需称“先生”的华东师大老教授，如今都已不在。

本世纪初，临近华东师大的长风公园内，游人常能看到两位老人相伴散步聊天，一个清瘦硬朗，一个敦厚温和。熟悉的人一看背影，便知是徐中玉和钱谷融两位先生。正如他们给人留下的印象，一人忧患，一人散淡，漫漫历史长河中，两位先生结下多年深厚友谊，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践行着知识分子近乎本能的“传道授业”之理。

“忧患”二字，是徐中玉一生都荷在肩上的责任。他曾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奋图强，誓雪国耻，要求进步，坚主改革，不论在什么环境、困难下总仍抱着忧患意识与对国家民族负有自己责任的态度，是同我们从小就受到的这种国耻教育极有关系的。”正如他的学生、上海财大人文学院教授吴炫所言，翻看徐先生的大部分文章，无论是古代文学研究，还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忧患意识贯穿始终，“仔细读徐先生的自选集，你会看到这样的忧患确实渗透在每一篇、每一页、每一行，成为先生挥之不去的文化血液和学术资质”。

在追忆徐中玉先生的生平时，华东师大校长钱旭红表示，先生一生爱书，手不释卷，但先生的研究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治学，而是以深深的忧患意识，直面所处的时代，回应现实中的矛盾冲突。在他对故纸堆几十年如一日的整理、发掘中，我们总能听到时代涛声的有力激荡，感受到那种对天下兴亡的深入关切。虽然求学时一直倾心于古代文论，但早在抗战时期前后，徐中玉就以持续不断的分析和谈论，将文学之于抗战的关系形成了《抗战中的文学》《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等专著，并提出怎样加强文学的抗战、抗战过程中文学目前的任务等现实意味强烈的判断和指导。在此过程中，他编著的《高尔基论文学》《伟大作家论写作》和《文艺学习论》，则从文学实践的角度引入中外作家的写作理念、经验和技巧，为青年写作者提供了丰富给养。苏轼所言“文必当中世之过”，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

在研读徐中玉抗战前后的著作过程中，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学振认为：“他抗战前后的几部专著，在揭示文学艺术奥秘的同时，均具有显著的服务现实的功利性，这是无需赘

“文学报”
文学照亮生活
徐中玉
2013.10.30

百岁徐中玉先生为本报题词